

# 党委中心组学习资料汇编

2016 年第 4 期（总第 58 期）

江苏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印

2016 年 6 月

## 目 录

### ◆ 高层声音

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1
袁贵仁在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016 教育主题是质量.....	14

### ◆ 学习参考

中国教育报评论员五论牢固树立新的教育发展理念.....	15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观察.....	20
教育部 2016 年工作要点.....	24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	30

### ◆ 报刊选摘

保持文明的好奇心.....	33
不要把人吓倒在起跑线.....	34
反腐败不是“权力斗争”.....	35
西式民主神话的破灭.....	36

### ◆ 原著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摘选）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41
实践论.....	46
矛盾论.....	54

## ◆ 高层声音

# 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1月15日，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战略主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公平为基本要求，以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以加强法治为可靠保障，以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作工作报告。他指出，2015年教育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构建育人新机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转变教育治理方式，推进教育对外开放，为“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划上了圆满句号。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普及程度快速提高，人力资源开发迈上新台阶；教育公平政策体系基本建成，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教育内涵发展稳步推进，质量标准体系逐步健全；教育改革有序展开，教育活力持续增强；教育经费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教育保障水平大幅提升；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持续保持和谐稳定良好局面。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与发达国家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

袁贵仁强调，“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我们要牢固树立、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活力，以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要实实在在地把质量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的主题，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内涵建设上，实现我国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为根本标准，提升学校办学综合实力、学生成长成才能力、社会贡献力、国际竞争力。

袁贵仁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教育系统要在国家总体战略和宏伟蓝图指引下，牢牢把握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任务。一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坚定不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千方百计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二是加快教育结构调整。要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进全民继续教育。三是下大功夫抓好教育公平。要精准帮扶困难群体，加快改造薄弱学校，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四是提升办学要素水平。要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依法保证教育投入稳定增长。袁贵仁强调，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和依法治教“双轮驱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紧紧抓住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个关键环节，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分类发展，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全面加强依法治教。

袁贵仁强调，要切实担负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四风”工作，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要在抓紧抓小抓细抓实上下功夫，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作风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教育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教育部门和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教育部机关处级以上干部、直属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 袁贵仁在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2016 年 1 月 15 日)

同志们:

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和教育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去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今年和“十三五”教育工作。

中央领导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十二五’时期,全国教育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向同志们特别是长期奋斗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衷心问候!‘十三五’时期,望牢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围绕保障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调整教育结构;进一步缩小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区域、校际差距,继续提高贫困家庭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教学和研究水平,重视加强创业创新教育,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育更多管用实用的高技能人才、创新人才和拔尖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好关键支撑作用”。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十二五”教育改革发展成就,深刻阐述了教育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 一、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刚刚过去的 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承前启后之年,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极不平凡。过去一年,教育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谋划、统筹安排,精准施策、定向发力,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工作有进展、有亮点、有突破。

一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从严治党的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章党规特别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认真讲好党课,开展专题研讨,深入查摆问题,强化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和建设,举办“全国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精神专题研讨班”,努力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全力维护高校政治安全、校园稳定。积极主动配合做好中央专项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次整体把脉,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全面体检,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坚决查处、公开通报。通过巡视,进一步深化了对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形势的认识,强化了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的责任担当。

二是构建育人新机制。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系统出台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政策措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修订课程标准、完善课程设置、修订学生守则,建立学生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学校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开展“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举办“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在全国布局 8700 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制定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构建美育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建立评价制度,评价结果记入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作为升

学评优参考依据。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举办首届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15年创业及参与创业大学生总人数42.3万人，比2014年增长6.8个百分点。首批确定165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国务院首次将每年5月第二周设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加强家庭教育，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

三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按照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原则，全面展开、有序推进。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至5个百分点以内，比2014年下降1个百分点。扩大实施专项计划，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定向录取贫困地区农村学生7.5万名，比2014年增长10.5%。全国性高考鼓励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63%。31个省份全面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自主招生调整为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重点考查学生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实际录取比2014年减少52%。通过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到招生计划数的50%。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扎实推进，其余29个省份也陆续制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首次从国家层面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便利作出规定。

四是推动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按照分类管理、多样化办学的总体思路，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多部门联合出台政策措施，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新批准一批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大学走出国门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办学。

五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从完善制度入手，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素质、优化教师配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这是国家第一个专门就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下发的政策文件，29个省份出台了实施办法。着力落实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中央财政核拨奖补资金22.8亿元，惠及乡村教师94.9万人。扩大实施特岗计划，除连片特困地区外，265个省贫县也纳入了实施范围，工资性补助标准提高到西部人均每年3.1万元、中部人均每年2.8万元。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发布普通高中校长、中职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将专业标准作为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出台《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研制《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加强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高校“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次设立青年学者项目。

六是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针对薄弱领域，构建经费投入长效机制。国务院决定从2016年开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两免一补”政策，实现相关经费可携带。建立完善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所有省份都制定了高职生均拨款标准，22个省份制定了中职生均拨款标准。进一步完善国家资助政策，高中阶段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年从1500元提高到2000元，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中职学校农村学生全部纳入助学金范围。国家助学贷款最长期限从14年延长至20年，偿还本金起始年限由毕业后2年延长至3年。

七是转变教育治理方式。系统谋划管办评分离路径，加快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评价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组织开展《职业教育法》首次执法检查。全部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清理工作，规范保留的教育行政审批流程，公开行政审批服务指南，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学幼儿园已建立家长委员会。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章程制定核准工作基本完成。在“一市两校”率先启动教育综合改革基础上，22个省份、100多所部属高校完成综合改革方案编制报备工作。重视社会监督和评价，委托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中国残联等单位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中期评估。在第三方开展的国务院部门信息公开测评中，2014年、2015年教育部均名列第一。

八是推进教育对外开放。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拓展教育对外交流合作。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强教育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制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深化沿线国家教育交流合作。全面启动非通用语种等五类国家急需人才培养工作。孔子学院、课堂遍布134个国家，孔子学院达500所、孔子课堂达1000个。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道，成为发展中外关系的三大支柱。

一年来的工作，为“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划上了圆满句号。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普及程度快速提高，人力资源开发迈上新台阶。201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75%，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小学净入学率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公平政策体系基本建成，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中央财政投入1200亿元，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学点的办学条件。投入100亿元支持中西部高校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投入60亿元支持14个没有部属高校的中西部省份建设1所有特色、高水平地方高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深入推进，1302个县（市、区）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召开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更好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权利。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国学生资助资金共计5564亿元，累计资助学生4.1亿人次，努力保障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13年超过70%。教育内涵发展稳步推进，质量标准体系逐步健全。全面修订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和教材。建立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体系。首次在全国启动义务教育数学、体育质量监测工作。全面对接职业标准，制定并公布410个高职专业、230个中职专业的教学标准。完成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制定工作。上海学生在世界经合组织开展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中连续两次获得第一。2013年我国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成员，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认证获得国际认可。我国高校600余个学科进入世界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前百分之一，约50个学科进入前千分之一。在刚刚揭晓的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项中，高校获得174项，占通用奖总数的74.7%。教育改革有序展开，教育活力持续增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取消下放21项教育行政审批事项，评审评估评价事项减少1/3。国务院出台《教育督导条例》，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设立教育督导局，整合监督评估职能，独立开展督学、督政和监测评价工作。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迈出关键步伐，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高校章程为基础，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理事会为支撑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出出国留学与学成归国同步扩大、来华留学与

攻读学位同步增长、“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提高的新局面，我国正成为新兴留学目的地国。教育经费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教育保障水平大幅提高。2012年首次实现4%目标。2014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达2.64万亿元，比2010年翻了近一番。五年共招聘农村特岗教师31万名，为中西部21个省份、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补充了新鲜血液。教育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85%，数字教育设备和资源覆盖全国全部6.4万个教学点。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持续保持和谐稳定良好局面。不断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广大青少年衷心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认同党中央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坚定。教育系统妥善应对境内外、校内外敏感复杂事端，高校连续26年保持和谐稳定局面。教育规划纲要中期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这些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

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们始终坚持以规划纲要为统领，汇聚各方力量。牢牢抓住教育规划纲要这张蓝图干到底，最广泛地统一思想，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上下联动、各方协同，汇聚关心理解支持教育工作强大合力。我们始终坚持以工作方针不动摇，保持战略定力。把育人为本作为核心内容，把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作为两大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改革创新作为两大重要保障，坚定方向、保持定力，一以贯之、持续用力。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期待作为努力方向，认真解决教育热点问题。择校、减负、高考加分、随迁子女入学升学等群众关切的问题得到缓解，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始终坚持以健全体制机制，狠抓工作落地落实。完善分工落实机制，提高落实能力，按照既定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明确实施进度和考核指标，及时跟进检查指导、督导评估。我们始终坚持以完善教育治理体系，努力提高治理能力。积极简政放权，重视标准和制度建设，完善学术治理，强化教育督导，发挥社会评价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社会真诚关心、积极支持的结果，是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员无私奉献、不懈奋斗的结果，凝聚着大家的智慧和汗水。在此，我代表教育部党组向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表示诚挚感谢！向长期以来奋斗在教育一线、为教育事业作出艰辛贡献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由衷敬意！

## 二、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教育质量的提高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描绘了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新蓝图。我们要在国家总体战略和宏伟蓝图指引下，认真谋划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人才竞争愈加激烈。世界各国竞相聚焦教育竞争力，纷纷制定出台教育发展规划，强调教育为未来发展做准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速度变化、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态势，亟需提升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力结构，厚植创新驱动根基。人口结构深度变化，老龄化加快、全面二孩政策对教育供给、布局 and 结构提出新的要求。要清醒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能很好适应这些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接不够，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教育发展还不平衡，结构不尽合理，各级各类教育贯通衔接不够畅通，城乡、区域、校际资源配置存在差距。教育管理、服务意识有待提升，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能力还不强，广大师生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全社会科学的教育观还未真正树立，实际工作、现实生活中背离科学的人才观、质量观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要整体提高 50 多万所学校、2.6 亿学生庞大教育体系的公平和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13 亿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十分艰巨。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以先进理念引领发展，牢固树立、全面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以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活力。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要创新教育观念，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促进学生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相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要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再少一些计划思维、少一些直接管理，更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调动学校、教师、学生积极性，激发全社会教育活力。要创新教育内容方式，深入掌握不同阶段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必须形成的核心素养，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学水平，掀起一场“课堂革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以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上，经济社会发展要依靠教育，教育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学校布局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层次类型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区域教育发展上，要加大对中西部教育支持力度，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水平。在城乡教育发展上，要把农村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健全覆盖城乡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在普职教育问题上，要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在公办民办教育问题上，要更加注重释放社会力量办学活力，鼓励民办教育发展，创新和扩大教育服务多样化供给。

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可持续问题。要深入研究、真正尊重、切实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按规律办学、按规律育人。要培养师生绿色观念，反对奢侈浪费，崇尚勤俭节约，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要建设绿色文明校园，以朴实、安全、适用为基本原则，杜绝豪华学校，营造浓郁人文环境，积淀深厚文化底蕴，提升办学品质，启迪学生心智，陶冶学生情操。

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要扩大系统内部开放共享，校校协同、城乡一体、科教结合、大中小学有机衔接。要主动对社会开放，深化与社会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让社会分享教育资源，形成家校共育、学校社会协同的良好教育生态。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双向交流、合作共赢，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要关注身处不同环境中的孩子，千方百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少年提供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要大力支持民族教育，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要更加重视发展继续教育，为进城定居农民工、现代职业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退役军人等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培训服务。

教育系统树立和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关系到各级各类教育全过程。当前最根本、最集中、最迫切的，是要切实增强质量意识，提高教育质量。抓住了质量这一主题，就抓住了新理念的要义和精髓。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具体到教育，特别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李克强总理要求，“十三五”期间要把教育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力争有新的突破。过去的一个时期，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精力、财力，建新校区、盖新大楼、买新设备，扩大规模、争取项目，这是必要的。但这些都终究是外延性的，只是提高质量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要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内涵建设上，实实在在地把质量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主题，实现我国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今天我们强调的质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下的质量，是全球教育竞争新常态下的质量，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新要求的质量。提高质量，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根本标准，全面提升学校办学综合实力、学生成长成才能力、社会贡献力、国际竞争力。提升学校办学综合实力，就是要遵循办学治校的内在规律，更新办学理念，提升管理水平，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不以学校规模大小比水平，不以论文数量多少论英雄。培育学生成长成才能力，就是要着眼学生全面发展、长远发展，培养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终身发展的能力，不单纯以升学率考核学校，不单纯以分数评价学生。增强社会贡献力，就是要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比水平、比贡献，更多的让社会评价教育、监督教育，不能关门办学，不能脱离经济社会主战场的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是要发挥我国教育传统优势，借鉴各国教育成功经验，增强中国教育的吸引力、影响力、引导力，在国际舞台上争高低，不能自拉自唱，不能自说自话。总之，我们要牢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转变思维定势，扭转工作惯性，增强提高质量的自觉性、主动性、紧迫感。

### 三、牢牢把握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任务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教育工作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战略主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公平为基本要求、以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以健全法治为可靠保障，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提高质量的政治要求。要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教育广大青少年时刻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坚定不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深入阐释、广泛宣传，丰富载体、强化实践，持之以

恒抓好落细落小落实。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抓紧义务教育品德、语文、历史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查、使用工作，更好发挥教材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系统传授作用。完成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将理想信念、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充实到课程标准中。加强高校马工程教材的编审和使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文明校园”建设为重要抓手，营造良好育人环境。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永恒主题，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信念。

千方百计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要始终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运动兴趣、养成锻炼习惯、掌握运动技能、磨练意志品质。今后，学生体质监测报告、学校体育督导评估结果要向社会公开。各级教育部门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校园足球等工作，带动学校体育蓬勃发展。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全面加强体育卫生、心理健康、艺术审美教育，培育学生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

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下决心彻底改变传统“闭门读书”的习惯，真正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强劳动教育，对各学段课程目标、主要内容和实践形式提出明确要求，让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参与劳动。加强社会实践，做好实习实训，推进志愿服务，开展研学旅行，让学生拓展视野、丰富知识、了解社会。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推进协同育人，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抓紧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学生休学创业，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让学生在创新创业中展现才华服务社会。各地各校要拓宽办学视野，拓展办学空间，积极主动寻求各方支持，努力把更多社会资源转化为教书育人资源。

## （二）加快教育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提高质量的主攻方向。结构也是质量，结构不合理、资源错配是教育最大的浪费。要抓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教育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推动教育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新需求。

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普惠性资源还相对短缺，特别是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基础还很薄弱，投入机制还不健全。要以完善普惠性幼儿园发展与投入机制为着力点，扎实推进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配套建设小区幼儿园，加大对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扶持力度。要创新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公办幼儿园、乡镇中心园辐射带动作用，让每一个在园儿童享受有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研究制订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扩大普惠性资源覆盖面，提高学前教育普及率，解决好学前教育这个短板。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教育部将出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施意见，明确普及的目标、任务和重大政策。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不足，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要实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攻坚计划，将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部分中部人口大省省级贫困县等纳入精准攻坚范围。要着力增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努力使没有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都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掌握一技之长，促进家庭脱贫，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

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高校转型，前提是政府改变管理方式，实质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修改高校设置标准，既鼓励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学校。制订应用型高校标准，引导高校面向市场主动调整专业设置和资源配置，对人才培养进行第三方特别是需求方评价。完善全国高等教育质量常态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增强学生、家长选择透明度，引导高校调整类型定位。中央财政将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等专项资金，对改革成效显著的给予奖励。各地要把转型试点和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加大对试点高校的支持。高校要依据区域性、行业性需求，加快发展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的新专业，拓展传统学科专业内涵。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更多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需要若干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这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一流大学是由一流学科构成的，要有一批一流的学科，为社会培养一流的人才，对国家做出一流的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一流的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坚持发展方向，改进实施方式。高校要以学科为基础，强化优势特色，自主确定建设目标，避免平均用力。政府要强化绩效评价，根据高校办学目标实现程度，对支持力度动态调整，避免只增不减。要形成开放机制，对支持的学科适时调整，避免身份固化。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重点依据已公开的数据、成果和质量报告，引导高校把功夫放在日常质量提高、一流水平建设上，避免不重平时、只在一时。教育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实施办法及资金管理办法。

推进全民继续教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传统产业形成巨大冲击，经济转型中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求人才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要更加重视教育职业培训，充分依托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建设职工继续教育基地，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帮助他们更好适应市场变化和就业条件变化。要更多地通过政府购买、财政补贴等方式推进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组织建设，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改革发展，办好开放大学，着力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施《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加强老年教育服务。要加快继续教育基础性制度建设，探索建立个人学习账号，推进学习成果积累和转换试点工作，推动多种学习方式、学习过程相互衔接，实现学习成果“零存整取”，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

### （三）下大功夫抓好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是对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而言的，促进公平是提高质量的内在要求。“家贫子读书”。中央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作为重要举措。我们要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实施精准帮扶，把钱花在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针对性帮扶上，使他们有现实获得感，使他们及其后代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竭尽所能，带着感情，用心用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各自的努力。

精准帮扶困难群体。要加大帮扶力度，坚持应帮尽帮、该补则补，确保帮扶不遗漏，资助不冒领。建立以学籍为基础的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与人口、低保、扶贫等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完善多部门合作机制，强化监护人的责任，构建政府主导、家校联动、社会参与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证件要求，为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提供平等入学

升学机会。落实“一人一案”，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用最大的爱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成才。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对虚报受助学生人数、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加快改造薄弱学校。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优化学校布局，努力消除城镇“大班额”，逐步实现区域内校际资源均衡配置。今年要把全面改薄工作进展情况作为专项督导主要内容，对项目进展不力、出现严重问题的地区进行问责，确保2018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造任务。《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95%的县（市、区）实现基本均衡。完成这个目标还有近1600个县（市、区），时间紧、任务重。今年至少要再评估认定500个以上，同时对已通过评估认定的组织监测复查。

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实施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优化顶层设计，整合工程项目，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启动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二期工程。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高考录取率，做好重点大学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工作，实现民族自治县全覆盖，比去年再增加1万人。做好教育部牵头联系滇西片区扶贫工作，对接政策、项目、资金需求，助力滇西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 （四）提升办学要素水平

人力物力财力既是提高质量的保障条件，也是提高质量的基础性要素。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李克强总理强调，无论财政收支压力有多大，我们对教育的支持力度不会减，向教师队伍倾斜的政策不会变，建设教育强国的决心不动摇。

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关键是教师。要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各地要认真落实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尽快实现连片特困县全覆盖。建立省级统筹规划、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从源头上提高乡村教师质量。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将对这项工作联合督查。要创新教师培养培训机制。完善国家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推动地方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养培训，落实好学前双语特岗教师计划，继续做好双语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加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高校、大中型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建教师培养培训体系。要大力推进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更加重视对教学水平的评价，更加重视教师科研成果的创新和实际贡献，促进教研相长、教学相长。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明确教师以身作则、教书育人的职责，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查处师德失范行为。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为提高质量提供了新动力、新手段。要继续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加强偏远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现互联网全覆盖和网络教学环境初步普及。要深入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组织建设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共享，探索信息技术支撑的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要完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向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推送优质教育资源。要坚持应用驱动，持续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的深度变革。

依法保证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投资教育就是投资经济、投资未来。国家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新修订的教育法再次明确了教育经费“两个提高”“三个增长”的

要求，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坚定决心。自 2012 年以来，尽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三年保持在 4% 以上，但一些地方在加大财政教育投入上有所松懈。要落实法定增长要求。特别是要保证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保证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逐步提高。要将教育经费法定增长落实情况纳入国家教育督导重要事项，要和转移支付、招生计划、院校设置等工作紧密挂钩。要以建立健全各级教育生均拨款制度为抓手，加快形成保证财政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今年要重点落实好统一后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建立健全中职学校生均拨款制度。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投入教育的积极性，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性、个性化教育需求，促进教育消费扩大升级。要突出经费分配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和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及革命老区投入力度，进一步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倾斜，向贫困学生、乡村教师倾斜，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切实把中央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要强化经费使用监管。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管理办法，堵塞管理漏洞。强化经费使用全过程监督检查，坚决依法依规查处浪费、挤占、挪用、贪污教育经费的行为。要落实管理责任，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使用绩效。拨付的钱就是要花的，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该花的一定要花好。有的钱既可以打酱油，也可以买醋；有的钱只能打酱油，不能买醋；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醋，都得有程序、讲效益、受监督。

#### **四、提高教育质量必须深化改革加强法治**

坚持深化改革和依法治教“双轮驱动”。通过改革调整政府、社会、学校的关系，释放办学活力。通过法治引领、保障、促进改革，构建有效支撑质量提升的教育治理体系。

深化“放管服”改革。中央反复强调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这是释放教育活力、提高教育质量的“总闸门”。要继续简政放权，深化管办评分离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规范审批行为，方便群众办事，方便学校办学。要切实解决检查评比多、随意性强、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能取消的取消、能合并的合并、能多部门联合的就不要一个个重复检查。要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今年要加快完善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用标准加强引导、加强监管、加强问责。要坚持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报告、专业评估报告、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教学质量常态监测数据都要向社会公开，并成为今后加强和改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基本数据。建立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制度，促进地方政府更好履行教育职责，健全教育督导制度体系。要强化服务意识，让学校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办学治校上。教育部门要回应学校办学需求，从学校反映最多、师生愿望最迫切的事做起，在教育教学指导、质量监测评估诊断、就业创业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要从调动教师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出发，积极稳妥推进学校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关心支持，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努力为他们成长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紧紧抓住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个关键环节。各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已基本完成，要按照方案提出的时间表，积极稳慎推进。要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推进考试内容改革。各地要加强考试机构和命题队伍建设，严格规范组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强化考试安全制度和体系建设。加快推行高职分类考试，进一步扩大录取比例。教育部将研究提出加强普通高中教学管理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导意见，各地要稳步推进选课走班，方便学生选学选考。要逐步建

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理想、心理、学业、生涯等方面的辅导。建立完善省级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电子化管理平台，建立诚信机制和公开机制，保证综合素质评价材料真实、可靠、管用。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分类发展。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学校关系，加快建立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制度，在法人登记制度、产权制度、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和审计制度等方面加快完善管理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要研究制订非营利性、营利性民办学校差别化扶持政策，特别是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土地划拨等方面加大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支持力度。研究制订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健全民办学校党组织设置，选好配强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办学治校中的作用。

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高校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力军。要完善科研组织方式，加强学科交叉，组建科研大团队，承担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要深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机制。要深入推进科技评价改革，系统调整教育部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社科基地评估导向和办法，将年度状态监测和专家评估相结合，更加注重实际贡献和创新质量。

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要提高出国留学效益。围绕创新驱动战略做好选派规划，更好发挥国家公派留学对高端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要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启动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出台《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等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更多国际优质生源来华学习，培养来华青年杰出人才。要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完善评估认证办法，建立年度报告制度，强化退出机制，形成高效可靠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和监督合力。要加强与港澳台学生、教师间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四地教育共同发展。

全面加强依法治教。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审议工作。加快《职业教育法修正案（草案）》《残疾人教育条例》送审工作。做好《教师法（修订草案）》《学前教育法》《终身学习法》《国家教育考试条例》《学校安全条例》《健全中小学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的意见》起草工作。出台《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为依法治校提供专业化法律服务。建立高校章程实施监督机制，引进第三方评价，加强对高校章程执行及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情况的指导评估。推进中小学学校章程建设。制订依法治校评价指标体系，将依法治校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方面。出台深化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通过教育执法促进教育法律全面有效实施。发布实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编写法治教育教材，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在广大青少年中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五、切实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教育工作面临的形势越复杂、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要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政治建设，最紧要的是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要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优势、学科优势，深入研究、系统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强化看齐意识，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矢志不移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十分重要。今年，中组部、教育部将制订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各级党组织都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意识，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四风”工作。认真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追求道德高线，守住纪律底线。要保持反“四风”、正党风、反腐败、倡清廉的战略定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始终握牢纪律戒尺。全面落实好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不折不扣、从严从实，全面整改。教育部将加大对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巡视力度和频次，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不整改、不查处的，要严肃执纪问责。要将巡视结果作为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体现在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的全过程。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的问题。严守有权不可任性，坚持信任不能替代监督，牢记严管就是厚爱的道理，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作风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现在，中央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以严的精神、实的作风推进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严明责任，把目标任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消除改革“中梗阻”，打通落实“最后一公里”。领导干部要在抓落实上起好示范表率作用，坚持重大问题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督办。要强化日常管理，深化平安校园建设，确保校园稳定和师生安全。要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善于把握本质、主流和趋势，善于把握社会心理，善于把握时度效，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争取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理解和支持。

教育部正在制订“十三五”教育规划，研究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意见，希望各地各校积极参与，多提意见。各地各校也要抓紧“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要全面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经济新常态对教育改革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明确思路，找准定位，确定目标，对拟纳入“十三五”规划的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要进行科学论证。要坚持开门编制规划，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把“十三五”规划编制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规划、全面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划。

同志们，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不断谱写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开创教育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016 教育主题是质量

2016 年教育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在今天召开的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回答：质量。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袁贵仁说，教育工作要紧紧围绕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战略主题。

袁贵仁坦承，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精力、财力，建新校区、盖新大楼、买新设备，扩大规模，争取项目，这是必须的。但这些都终究是外延性的，只是提高质量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要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内涵建设上，实实在在把质量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主题”。

具体而言，他说，提升学校办学综合实力，就是要遵循办学治校的内在规律，形成良好校风学风，“不以学校规模大小比水平，不以论文数量多少论影响”；培育学生成长成才能力，就是要着眼学生全面发展、长远发展，培养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终身发展的能力，“不单纯以升学率考核学校，不单纯以分数评价学生”；增强社会贡献力，就是要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比水平、比贡献，更多地让社会评价教育、监督教育，“不能关门办学，不能脱离经济社会主战场的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是要立足中国大地，充分发挥我国教育传统优势，建设教育强国，增强中国教育的吸引力、影响力、引导力，在国际舞台上争高低，“不能自拉自唱，不能自说自话”。

袁贵仁一再强调：“当前最根本、最集中、最迫切的，是要切实增强质量意识。”结构调整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主攻方向。袁贵仁说，结构也是质量，结构不合理、资源错配是教育最大的浪费。

他说，要修改高校设置标准，既鼓励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学校。制定应用型高校标准，引导高校面向市场主动调整专业设置和资源配置，对人才培养进行第三方特别是需求方评价。完善全国高等教育质量常态检测国家数据平台，增强学生、家长选择透明度，引导高校调整类型定位。中央财政将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等专项资金，对改革成效显著的给与奖励。

同时，高校也要坚持学科为基础。袁贵仁说，高校要强化已有优势，自主确定建设目标，“避免平均用力”。而政府要强化绩效评价，根据高校办学目标实现程度，对支持力度动态调整，有多有少，避免只增不减。此外还要形成开放机制，对支持的学科适时调整，有进有出，避免身份固化。

“提高教育质量是对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而言的。”袁贵仁说，“整体提高 50 多万所学校、2.6 亿学生庞大教育体系的公平和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13 亿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十分艰巨。”

## ◆学习参考

# 中国教育报评论员五论牢固树立新的教育发展理念

## 以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活力

### —— 一论牢固树立新的教育发展理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十三五”时期，要牢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保障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好关键支撑作用。随后召开的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要牢固树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实在在地把质量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主题，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内涵建设上，实现我国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牢固树立、全面贯彻新的教育发展理念，首先在于以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活力，这凸显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重大论断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引领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态势，亟须提升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力结构，厚植创新驱动根基。人类的发展史，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发展史充分证明，自然资源会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却会越用越多。然而，人口结构深度变化，老龄化加快、全面二孩政策这些现实变化，对教育供给、布局和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只有用创新发展激发新的教育活力，充分发挥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作用，才能为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永续不断的能量。

教育规划纲要的中期评估结果，得到舆论的充分肯定，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还在路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以创新发展的理念去面对。无论是教育结构还是培养模式，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相对于人民群众对更好的教育的期盼，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也还没有最终形成。特别是作为一个拥有50多万所学校、2.6亿名学生的庞大教育体系的国家，教育发展还不平衡，结构不尽合理，各级各类教育贯通衔接不够通畅；教育管理、服务意识不尽如人意；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还不强；科学的教育观、人才观还没有真正树立。这都需要我们充分发扬创新精神，探索创新路径，进一步创新教育观念，进一步创新教育体制机制，进一步创新教育内容方式，使教育在创新发展中回归人才成长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凡是阻碍人才培养的，我们都应当改革。”改革，只有改革才是教育创新可持续的根本保障，只有改革才能革除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还不尽合理、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任务艰巨、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还有待优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有待完善、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空间还有待拓展等，都需要靠创新管理来驱动。创新是一种文化，但更是一种制度环境，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只有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才能生长出来，创新需要必要的管理，但更需要切实的服务。改革，就是要靠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释放教育创新发展的活力，来为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管理者少一些计划思维、少一些直接管理、少一些不当干预，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教育者多研究不同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必须形成的核心素养，千方百计提高教学水平。

教育的先导性，决定了创新发展不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创新已是当今世界国家竞争的核心，谁能主导创新，谁就能主导规则，谁就能决定竞争格局，但归根到底，竞争的还是教育的创新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没有创新，就谈不上教育现代化。只有以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活力，才能培养更多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才，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 以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

——二论牢固树立新的教育发展理念

“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调整教育结构”“进一步缩小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区域、校际差距，继续提高贫困家庭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教学和研究水平，重视加强创业创新教育，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育更多管用实用的高技能人才、创新人才和拔尖人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对教育工作的批示中提出的三个“进一步”，深刻阐明了“十三五”时期教育协调发展的战略方位。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实实在在地把提高质量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主题，并将优化教育结构作为提高质量的主攻方向。

教育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深层问题。站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以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解决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直面痛点、主动出击的务实担当之举。

经济学上有一个木桶原理——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体量巨大的数据增长和光鲜亮丽的成绩背后，教育结构的短板也愈发明显。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却是企业用工荒；一边是城市学校学位难求，一边却是乡村学校日显凋敝；一边是公办学校做大做强，一边却是民办教育参差不齐……教育结构不合理，已然成为制约中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明显短板，需要深入问诊，更要对症下药。

教育结构不合理不是一个新问题，以往我国教育往往通过外延式增长就可获得快速发展，但也使得内涵建设层面的一些问题被忽略，尤其是教育结构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存在方方面面——人才培养结构问题，城乡教育结构问题，公办民办教育结构问题，普教职教结构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以问题导向为“透视镜”，其中协调发展理念即是形成平衡发展结构的科学方法论。协调发展应成为我们破解教育结构难题，进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思想利器和实践指南。2015年底，三部委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表明国家已经着手从分层到分类的思路来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可谓是人才培养结构协调发展的大动作；同样是2015年，国务院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教育均衡最为核心的要素——师资力量入手，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可谓是城乡教育结构协调发展的利器；而在更早之前，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全力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可谓是普教职教协调发展的大手笔……在“十二五”之末，顶层设计的思路已经明确，我们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之上。进入“十三五”，我们应在这条路上迈开更大的步伐，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将协调发展落实到教育系统的每一条毛细血管。

如今，我国教育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老百姓已不满足于获得教育入学机会的“温饱”需求，而是对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有了更高的期待。因此，任何教育改革，都必

须有一种整体观，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的平衡问题。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既要城市教育优质，也不能让农村教育凋敝；既要东部率先，也要中西部崛起；既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也要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既要公办教育红红火火，也要民办教育春意盎然……通过协调发展理念引领教育结构优化，增强发展整体性，是真正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关键之举。只有坚持协调发展教育理念，才能使教育充分对接经济社会需求，让更多的人获得分享教育发展成果的机会，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带来更多社会就业和人的自我实现机会，并最终促进人和社会的整体和谐。

优化调整教育结构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所涉之处，或静水深流，或暗流汹涌，特别考验改革者的胆识与智慧，既要有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和勇气，又要始终将协调发展理念贯穿整个改革过程，以统筹兼顾，保持平衡。改革唯不忘初心，以供给侧突破、协调发展，方得质效倍增。

### 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

#### ——三论牢固树立新的教育发展理念

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未来教育发展，强调“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意在解决教育的科学发展、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绿色发展，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蕴含的是简约朴素、返璞归真的自然本色，彰显的是风清气正、公平正义的文化环境。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时尚，就是回到教育的本原上去思考教育面临的问题，实现教育和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化解内部矛盾，优化外部环境，最终促进教育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就是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离开了对教育规律的研究与尊重，无法真正实现教育的目标，也不可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只有按照规律办学、按照规律育人，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用绿色发展理念，让教育立足于生命原点，教育才可能实现拓展每一个生命的美好愿景。

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就是要从外延拓展回到内涵建设上来，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人。教育行政部门要大力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保障充足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加强经费的绩效管理，不能让校舍建设变为政绩工程；教育管理者则须树立节俭朴素的办学理念，让教育经费真正用在学校真正所需和学生必需的开销上，而不是追求外在的奢华。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言，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精力、财力，建新校区、盖新大楼、买新设备，扩大规模、争取项目，这是必要的。但这些都终究是外延性的，只是提高质量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要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内涵建设上，实实在在地把质量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主题，实现我国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就是要培养师生绿色观念，加强生态文明的教育。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特征。“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遍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绿色梦想，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也有赖于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实现。环境问题是全球化难题，生态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教育者，我们有责任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反对奢侈浪费，崇尚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让

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绿色化，只有受到生态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生活的环境才能文明起来、美丽起来。

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就是要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青山绿水”，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有了快速发展，教育综合改革也在如火如荼推进。但是，与此同时，教育系统一些不正之风，特别是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等问题也污染着教育生态。原本单纯的教书育人活动，由此承受了许多不应有的负荷，最终影响的是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走绿色发展道路、树立尊重规律的教育理念的同时，也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坚持依法治教、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时刻把纪规挺在前面，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真正让教育成为守望社会的一方净土，涵养文明的精神“湿地”。

我们应当抱有这样的信心：绿色发展必将使教育呈现出勃勃的绿色生机，必将使教育教学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

### 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

#### ——四论牢固树立新的教育发展理念

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迅猛发展，发展重点已经转变到提高质量上来，然而教育资源不足成为影响我国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制约因素。事实上，当前很多学校的办学资源仍存在较大缺口，高水平教学所要求的高标准资源配置不足，这就需要解决教育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

教育资源筹措的渠道不外乎两种。一是增加公共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教育财政投入，不但实现了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而且还通过增加科研投入等其他渠道，改善办学条件。客观地说，政府在公共财政分配中尽了最大努力，但教育发展需求巨大，单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拨款难以满足发展优质教育的要求。二是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本投资成为社会产业和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到2015年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35.7万亿元。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是扩大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水平，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之举。

实现教育开放发展，涉及教育内外诸多方面，首先要扩大系统内部的开放共享，使校校协同、城乡统筹、科教结合、大中小学有机衔接。我国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类型之间互动往来、资源开放共享比较有限，即便在相同层次和类别之中，不同教育机构之间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也较低，导致有限的教育资源未能发挥应有效益。加大教育系统内部开放，促进不同教育机构之间在教师、设施设备、课程等资源方面的共享利用，不仅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而且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庞大的教育规模需要充足的教育资源支持，国际经验表明，教育系统规模越大，越要落实教育治理改革，建立有利于社会资源持续投向教育的体制机制。我国改革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发展民办教育，但这还不够，距离“十三五”规划要求的“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尚存在诸多阻碍，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又有政策和体制机制方面的。扩大教育开放，必须消除各种阻碍，拓展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办教育的渠道，同时建立社会力量和民间

资本参与办教育的差别化扶持政策和机制。总之，要主动对社会开放，深化与社会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让社会分享教育资源，形成家校共育、学校社会协同的良好教育生态。

今天，中国教育与全球教育从未像现在这样联系如此紧密，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教育开放发展，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新需要，更是新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双向交流、合作共赢，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一带一路”战略是经济战略，也是教育战略。我们要主动走出去，大胆引进来，加强我国教育与世界各国教育的互通互利，拓宽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渠道，推动教育资源的国际交流与共享，为我国教育实现内涵发展、提高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搭建更宽广的平台。

拓展教育资源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基础，开放是手段，发展是目标。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是新时期保障、丰富、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和配置的必然选择，也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由之路。

## 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 ——五论牢固树立新的教育发展理念

日前举行的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教育的共享发展，要解决的其实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中央要求“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对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而言的，促进公平则是提高质量的内在要求。共享发展就是要分好蛋糕，让人民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使全体人民在教育改革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让人民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经历平等的教育过程，获得公平的教育结果。

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必须建立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树立包容性发展理念，有助于消除隔膜、减少排斥、促进融合。我国教育公平的价值诉求应当是让全体儿童、全体教师和全体学校和谐相处、共享发展、共同发展。这意味着，无论是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特殊儿童还是贫困儿童，都应享有与其他儿童平等的教育权和发展权；这意味着，无论城市教师还是农村教师，都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在工资收入与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其付出对等的回报，在专业发展、生活质量方面享有同等的出彩机会；这还意味着，各级各类学校有同等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机会。本质上，包容发展是承认差异、尊重差异、鼓励多元的发展。

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必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择校热”“学区房”“城镇大班额”等热门教育问题，无不显现出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热切期盼。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不仅是“有学上”的问题，更是“上好学”的问题；不仅是入学机会公平的问题，更是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公平的问题；不仅是统一的学校教育问题，更是为社会各群体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继续教育培训服务的问题。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是实现教育共享发展的重大议题。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除了依靠传统的校舍改造、教师流动等模式外，还应拓展新路径，在课程资源、教学方式、学习环境、教育评价等方面深化教育内涵，提升教育品质，塑造教育的新生态。

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公平问题，各地也结合实际探索多样化的教育均衡发展模式。“强弱学校捆绑发展”“学区制建设”“教育网络联盟”“校长教师轮岗交流”等举措，为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教育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少地方的学校“联合”“捆绑”还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基于学校和教师内在发展需求的互帮

互助、共享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中西部地区、困难群体、薄弱学校仍是短板。在教师之间、学校之间，以强带弱、共享发展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从制度变革的视角来看，在财政投入、教师配置、考核评价等方面构建起激励性制度体系，推动教育共享发展，并使之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当务之急是从教育评价制度变革入手，构建起包容性的、共享性的教育评价制度，切实推进教育公平，让共同发展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家贫子读书”。中央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作为重要举措，这就要求教育战线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实施精准扶贫，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使特殊困难群体及其后代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而抬高底部，补齐短板，提升内涵，实现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观察

### 今年，教育的劲儿往哪使？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观察（上）

新形势下，面对创新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高等教育路该怎么走？

在当前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培养更多高水平技能型人才？

面对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到 2020 年全面脱贫目标，教育精准扶贫如何实现？

刚刚走过“十二五”，面对接踵而来的“十三五”，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1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分组讨论上，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教育部门的“当家人”，以及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负责人，围绕这些教育发展改革中的问题各抒己见，集聚众智，共同求解。

所有这些，汇成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教育的劲儿往哪使？”

#### 高等教育：

一手抓“双一流”一手抓转型

“双一流”和应用型，对高校而言，似乎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哪条路？如何选？

“有些高校觉得如果转成应用型会降低学校层次，老百姓对学校的评价降低，也会影响学校的发展。”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坦言，面对建设“双一流”和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在高校层面仍存在争论。

2006 年开始讨论转型、2008 年开始转型的经历，让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深深感觉，对地方高校来讲，当初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的路选对了。“2015 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88%。这几年，安徽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都非常高，效果很明显。”

程艺说，从安徽的实践看，以专业结构调整为代表的有形的转型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安徽一些新建本科高校是从师专升格起来的，而师专的专业设置非常简单，数理化音体美，变成本科后如果专业不调整，势必带来就业问题。“当时的调整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坚持有条件要调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调整。”程艺说，当时的情况是，安徽省中小学教师每年的需求量仅有 1 万人，而师范类专业的招生高峰达到每年 5 万人，经过转型调整后，招生规模降下来了，仍能满足需求。

“工作报告中提到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我们从字里行间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王璟认为，现阶段对转型问题存在争论很正常，但不应因这种争论影响学校找准自身的定位。“要找准学校定位，就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开展教学、科研、育人工作，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双一流’的规划是在总结以往‘985’‘211’建设评选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战略发展思路和方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个重大举措，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认为。

“在统筹建设‘双一流’问题上，总体态度积极。但具体到不同层次、类别高校如何借助‘双一流’建设方针找准定位，有的模糊不清，有的比较茫然，有的期望偏高。”线联平认为，我国真正有能力冲击世界一流的高校不会很多，更多的高校需要通过一流学科建设提升学校实力，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特色、实现国际引领。如果不进行科学论证，一窝蜂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容易出现浮躁。

在分组讨论中，不少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厅厅长表达了对“双一流”的多元化期待。除了世界一流，也可以考虑建设区域一流，让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普布次仁一方面欣喜于这些年西藏高校的快速发展，建起了博士点，争取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支持，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西藏高校在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方面的差距，希望能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也希望国家在相关政策方面对西部省份有所倾斜。

### **职业教育：**

让学生看到“上升”的空间和希望

“职业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却是各级各类教育中最让我们头疼的一块。建学校、建职教中心，但为什么社会不买账、老百姓不买账？”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记者发现，好几个组一开场就把关注点引向职业教育。在当前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各行各业呼唤更多高水平技能型人才的形势下，职业教育自然成为各地教育“当家人”关注的焦点。

学生和家长的愿望是上普通高中、读大学，而国家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缺的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矛盾怎么破？

此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要着力增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努力使没有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都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掌握一技之长，促进家庭脱贫，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

安徽教育厅厅长程艺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可以说普及高中的重点在职业教育。”在程艺看来，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一是靠质量，二是靠打通人才培养的立交桥，让读职业教育的学生看到“上升”的空间和希望。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供给侧改革，职业教育也存在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大连市教育局局长赵阳说，“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目前我们的职业教育正在积极调整，大数据、‘互联网+’、3D打印等专业都在积极开设。”

安徽省近年来尝试职业教育的市级统筹和资源整合，结合本省经验，程艺提出，“县域产业单一，对发展职业教育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怎么抓，而市一级产业更为全面，而且中职、高职都有，更适于进行统筹”。

“过去，一个国贫县办8所中职学校，每个学校都招生困难，老师的工资都要全额拨款，学校也没钱更新设备，搞个手扶拖拉机的机头就号称是汽修专业，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程艺说。据介绍，安徽省对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去年撤并60多所中职学校，前年撤并100多所。

程艺表示：“从这次工作会来看，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充满信心，会议传递出的理念很先进，国家层面的措施也很有力。下一步关键是各地要结合实际，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产业结构的实际、各个学校办学的实际。不能追求一种大而化之的模式，必须坚持特色，不求全覆盖，但求对某些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考虑。”

“对示范性高中，政府特别愿意投钱，但是一到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就有很大的落差，只要家长到这两种学校去转一圈，高下立判，家长怎么可能愿意让孩子去职业院校？”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说，“我在各个地市动员办好职业院校的时候总说，不要老提让家长转变观念，最应该转变观念的是政府，政府转变了，老百姓才能转变。”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呼吁尽快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比如，确定对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这是促进校企合作、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最关键的问题。这些解决了，可以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 **教育扶贫：**

直抵大山深处 实现精准扶贫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教育扶贫成为中西部省份教育“掌门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话题的焦点就是如何让教育扶贫直抵大山深处。

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赵为粮介绍，该市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了摸底，学费加上生活费，一个大学生一年需要2万至2.2万元，重庆除了将助学贷款提高到8000元外，还给每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提供了一个月600元、一年10个月的生活费补助，再加上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等，“努力让大学生不要成为家庭负担”。

重庆市作为唯一一个西部直辖市，在实践教育扶贫上将专注点放在了解决因学致贫人群上，“锁定贫困的大学生群体，实现精准扶贫”。

每一位来自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厅厅长心中都有一笔账：贵州，仍有600多万贫困人口；广西，边远地区教学点仍有9000多个；云南，2015年只有9个县市完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位厅长道出了中西部教育的心声，“教育系统怎样精准扶贫、全覆盖，具体政策措施还需进一步加强”。

“我建议加快改造薄弱学校，资源向中西部倾斜均衡，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第一次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王凤友在谈及“十二五”成就的同时，更带来了“十三五”期间中西部教育深入发展的思考。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尽管各省份一直在“勒紧裤带办教育”，在硬件和软件上投入力度很大，但是一直是“小马拉大车”，并不轻松。

“贵州初中生寄宿率达到70%，小学寄宿率也达到了30%，教室数量不够，城镇大班额突出，不少地方两三个孩子住一个床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王凤友看来，尽管“十二五”期间下了很大

的力气，但是中西部，特别是山区、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吃住、教师配备、厕所等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建议“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向西部倾斜，向大山深处倾斜”。

“用一句话概括‘十二五’期间四川教育的情况，就是穷省办大教育。”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说。

凉山地区是四川基础教育集中落后地区，为此朱世宏曾做了一个调研，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凉山那么落后，孩子们还不愿意上学？”

调研发现一个重要情况：“前三年读小学，学生们基本听不懂课。”

为此四川抓了一个大工程——一村一所幼儿园。“采取每个村幼儿园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两个教师，着力解决民族地区学生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问题。从娃娃抓起，从幼儿抓起，全部学汉语，同时把习惯养好。”朱世宏说，四川计划从2016年开始，在凉山、阿坝和甘孜三个州的51个民族自治县全部实现十五年免费教育，以提升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 2016，教育难点如何攻？

——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观察（下）

学校“乡弱城挤”，师资结构性短缺，民办教育亟待规范发展……

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这些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和群众关切的热点，一直是各地教育部门“当家人”和教育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关注的焦点。

2016年，“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一些教育领域体制性、制度性的障碍需要“破冰”，一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亟待“破解”。这，正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师缺编咋办？

把招聘权交给教育部门

“放开二孩”之后，教育怎么接招？这个问题，对地方教育部门来说，最直接的挑战，是即刻出现的教师短缺问题。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对学校来说，入学问题可能会晚几年出现，但是教师的问题，现在就需要重视。我建议适当增加编制，增配教师。”

新建了学校却没有教师，这样的尴尬在外来人口居多的广东更加突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每次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去协调教师编制，省编制部门都拿中央来说事。

可是，罗伟其也有一肚子委屈：“教师编制的计算并不是按照学生实际的人数，而是按照2012年的编制基数，而且我们一些欠发达地区本来就没有配足，当时请了很多代课老师，清退了这些教师之后，空出了一些编制，按照标准补齐这部分，编制部门也不同意。”

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说：“‘十二五’期间，天津人口以每年五六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速度增长，面临的问题是教育资源永远是短缺的，怎么建怎么不够。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空间很大，农村小科教师结构性缺编。”

在分组讨论中，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王定华说：“教育部正在牵头研究统筹城乡一体化教育相关政策，大家关心的与人社部门、财政部门的协作，也有一定的突破。尽管将来教师编制的总额还是人社部门说了算，但是招聘的权力归教育部门，在岗位协调上，以县为主进行统筹。”

# 教育部 2016 年工作要点

2016 年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战略主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公平为基本要求、以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以健全法治为可靠保障、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 一、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作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纳入干部培训教学计划。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专题党性教育。巩固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推动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认真落实《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员干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规定》，切实加强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 切实加强学校党建工作。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专项督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落实情况，健全高校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制订加强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的意见，制订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制订关于加强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召开全国高校党建工作年度会议。出台关于加强民办高校、中小学党建工作的意见。召开全国中小学党建工作会议。

3. 加强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学风建设。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工作各项要求，保证巡视后的整改落实工作取得成效。落实中央巡视组巡视中管高校的工作要求。强化对被巡视单位党组织的巡视，突出政治巡视。结合教育巡视工作实际，制订《贯彻巡视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出台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严厉打击学术造假行为。切实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落实窗口服务单位首问负责制，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意识。健全完善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受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教育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4. 加强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做好各级各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加大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力度。积极推进教育系统内外干部交流，选派优秀干部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青海等艰苦边远地区挂职、任职。研究制订高校、直属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坚持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规范直属高校、直属单位领导班子薪酬管理。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5.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切实执行“六大纪律”。举办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题培训班。把廉洁从政作为专门的教学单元纳入党员干部培训计划，坚持廉政谈话提醒制度。全面落实教育部党组《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举办专题培训班。加大对违纪和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严格实行问责“一案双查”。认真做好廉政风险点的动态监控。

6. 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开展安全教育教学能力展示活动。深化平安校园建设，研究制订加强高校安全稳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中小学校安全防控及评估指标体系等文件，

开展校园安全稳定隐患排查和依法整治、强化校园反恐防范工作。健全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制度。推动各地制订省级校车服务方案。继续开展“护校安园”行动。

## 二、始终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7. 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推动中小学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印发《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推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好2016年全国“开学第一课”。促进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推动区域性班主任工作共同体建设。启动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修订《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完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启动新一轮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工作。指导支持关心下一代工作。

8. 深化课程改革。抓紧义务教育品德、语文、历史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治教育等内容。组织开展新编三科教材使用工作。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加快推进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印发《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基础教育装备工作的意见》，研制基础教育装备管理办法。启动建立基础教育课程实施监测机制。印发新修（制）订的中职部分公共基础课程标准。加快推进“马工程”重点教材编写审议和统一使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全面实施高校思政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实施好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计划和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研究制订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加强高校出版阵地管理，提高教材等出版物质量。

9. 切实加强学校体育美育工作。出台关于深化学校改革、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实施意见，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和体质健康水平。实施学校体育改革示范引领项目。举办全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加快推进校园足球的普及，广泛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竞赛，加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单位建设。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深化学校美育综合改革，进一步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启动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签署工作，推动以省为单位确定推进学校美育综合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深入推进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工作，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与基地建设。探索建立学生军事营地育人长效机制。

10. 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继续实施系列卓越计划和协同育人行动计划，推动人才培养联盟建设。建设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综合性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和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教育基地，引导高校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一批与行业企业共建的协同育人开放共享实践基地。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推进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开展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意见、博士生导师学术指导职责指南。

11. 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推动高校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面向全体学生开发开设纳入学分管理的创新创业课程，推出一批资源共享的创新创业教育

在线开放课程。推动高校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建设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配合实施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办好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推动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推动各地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建设一批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12. 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全面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优化乡村教师资源配置，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继续实施特岗计划，推动城镇优秀校长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推动地方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国培计划集中支持中西部乡村教师校长培训。推进教师教育改革，深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加快研制中小学教师校长培训课程标准。深入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启动实施“十三五”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完成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和首次评审工作。推动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继续推动落实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13.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加快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大力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完善偏远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加快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提高师生信息素养，普及信息化教学常态应用。完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建设在线开放课程等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推进线上线下结合的课程共享与应用。推动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的整合与应用。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14. 深入推进语言文字工作。发布实施《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加强重点区域和行业领域语言文字工作。启动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研究制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组织举办第1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大力提升青壮年农牧民普通话能力。研究制订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扎实推进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推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发布《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9个分则国家标准。大力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督导与评估。

### **三、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为教育事业发展注入动力活力**

15. 制订实施教育“十三五”规划。做好教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明确“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政策举措。组织开展宣传和解读，推进规划的实施及监测。

16. 推进民办教育分类改革。进一步修改并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研究制订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序实施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召开全国民办教育工作会议。

17.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指导各地落实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印发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文件。加强普通高中教学管理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指导。加快推进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突出“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评价方式，进一步扩大高职分类考试录取的比例。推进考试内容改革，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确保国家教育考试平稳安全有序进行。扩大重点高校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定向招生计划。加强对特殊类型招生的规范管理。探索研究生招生计划分类管理改革办法，推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博士

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和“分流淘汰”机制。研究制订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加大对高校招生的监管力度，落实招生信息“十公开”，严肃查处各类违规招生行为。

18. 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教育行政审批行为，推进教育行政审批网上平台建设。进一步落实和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进中小学章程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推进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学术委员会、理事会等制度，建立健全高校章程实施的监督机制。加快完善国家教育标准体系。做好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推进部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机构布局优化调整。

19.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制订“双一流”实施办法，研究制订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办法，建立信息公示网络平台。推进教育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更大力度落实“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进一步加大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倾斜力度，加大力度支持培养青年人才。制订实施高校科技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组织高校承担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和国家实验室建设任务，组织高校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建立完善高校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机制，推动高校建立知识产权运营机构。深入推进科技评价改革，完善教师考核评价和学科评估机制。持续推进“2011计划”取得实效。深化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改革，启动高校专业化智库建设。

20. 着力提高教育经费保障与管理水平。督促各地依法落实教育经费法定增长，建立健全教育投入长效机制。从2016年春季学期起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督促各地落实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推动建立健全地方所属高校研究生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成本分担机制，规范学校收费管理。推进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改革。加强改进教育经费统计工作，加大教育经费使用监管力度，推动财务信息公开。

21. 进一步强化教育督导。印发《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暂行办法》。继续开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开展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评估认定。印发《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办法》《中小学校管理评价办法》。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和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制订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评估试点方案。开展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

22. 大力推进依法治教。加强教育立法，配合做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审议，起草上报《职业教育法修正案（草案）》。起草完成《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国家教育考试条例（草案）》。落实《全面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推进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治校能力建设，深化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教育系统法律顾问制度。全面加强学校法治教育，实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支持体系和评价机制。启动依法治校示范校和法治校园创建活动。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学校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育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23. 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布局。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开展教育合作交流。充实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六个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内涵，开创人文交流新局面。推动与教科文组织建立高层定期磋商机制。贯彻《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办法》《高等学校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打造“留学中国”

品牌，优化出国留学服务。试点探索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走出去”的发展模式。编制孔子学院“十三五”行动计划。加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

#### **四、坚持协调发展，不断优化教育结构**

24. 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全面推进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国家学前教育重大项目。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国家实验区建设，完善普惠性幼儿园发展机制。出台新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研究制订第三期学前三年行动计划。

25.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印发《关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全面实施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提供和做好部分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的意见》等配套文件，确保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关政策落地。深化《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贯彻实施。加强义务教育基础信息管理工作。

26.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做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顶层设计，研究制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攻坚计划。制订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发展倾斜政策。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继续实施普通高中改造计划。

27. 加快推进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启动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研制工作。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编制《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推动实施《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开展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制订《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规划（2016-2020年）》。继续实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启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开展县级职教中心综合改革试点。

28.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与结构。制订并出台《教育部关于“十三五”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十三五”高校设置方针和政策。修订《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组建新一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研究制订《关于进一步优化高校专业结构 加强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建立国家宏观调控、省级整体统筹、高校自律自律的专业设置管理机制。建立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布局需求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引导高校设置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善民生急需的专业。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大支持力度，有序开展改革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建立跟踪检查和评估制度。加强涉农专业全日制学历教育，支持农业院校办好涉农专业。

29. 创新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推进继续教育基本制度建设，印发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出台推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开放大学开展学分银行试点工作。发布并实施《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制订出台指导学分互认和转换制度建设的框架性文件，开展学习成果积累和转换试点，建立灵活学习制度。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测评工作。出台促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办好201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依托职业教育资源，发挥好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的引领作用，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工作。

#### **五、坚持共享发展，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

30. 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继续扩大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等专项计划，对民族自治县实现全覆盖，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教学成果对中西部省份教学改革的覆盖。实施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继续做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专项规划》落实，建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动机制。

31. 努力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督促各地进一步健全学前教育资助政策。继续组织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等相关政策。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研究生奖助政策，推动出台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加大宣传力度，确保资助政策家喻户晓。

32. 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全面落实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按照“一人一案”，重点解决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问题，继续增加残疾儿童少年非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提高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探索建立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制度。继续实施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项目。深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建设。研究制订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农村学校寄宿条件，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推动落实“两为主、两纳入”政策，推动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和“两免一补”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制订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办法，为随迁子女入学提供便利条件。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提高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水平。完善留守儿童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制订着力加强教育脱贫的实施意见和做好新时期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滇西片区脱贫攻坚“十三五”实施规划》。

33. 加强民族教育。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制订学校民族教育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建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机制。印发《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指导意见》。启动《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普通高中）》修订工作。印发《内地民族班改革和发展长远规划（2016-2025年）》。修订印发《进一步加强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工作意见》，推进内地民族班混班教学、混合住宿。启动实施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工作。启动新疆双语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落实推进西藏和四省藏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

34.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就业创业。着力落实好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研究生计划等政策。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全面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精准推送就业服务机制，积极举办多种形式招聘活动。做好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毕业生统计和帮扶工作，配合实施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引导有志投身现代农业建设的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等加入职业农民队伍。

#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

教党[2016]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党委，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的通知》精神，现就高等学校做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通知如下：

## 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意义。

在高等学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今年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龙头任务，也是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的有力抓手。各地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和高校党委要站在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要求上来。要将学习教育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提高教育质量结合起来，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各个方面，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激励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事创业、开拓进取，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 二、结合实际，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紧密结合高校实际，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进高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准确把握目标要求。高校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要任务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尊崇党章、遵守党规，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区分层次，突出正常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坚持“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和道德行为不端等问题。高校各级党组织要紧密结合学校党的建设、党员队伍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增强针对性、解决突出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始终。

2. 聚焦学习教育内容。学党章党规，要通读熟读党章，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学系列讲话，要按照中央要求，区别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有关书目材料，结合高等教育实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高校党委、院（系）级党委要把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学习教育内容。做合格党员，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师生的党员意识，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政治家、教育家要求，做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教师党员要自觉践行“四有”好老师标准，自觉爱党护党为党，敬业修德，奉献社会，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学生党员要做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表率，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3. 有效把握方法措施。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突出常态化教育的特点，不搞成一次活动。要注重把握工作原则，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要采取有效组织方式，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坚持党内既有制度，探索抓好经常性教育。要抓实抓好规定动作，做好围绕专题学习讨论、创新方式讲党课、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立足岗位作贡献、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表率，环环相扣，有机推进。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高校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结合实际开展学习教育，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主动性，完善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将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的做法以制度形式巩固下来，不断完善党内经常性教育机制，推进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4. 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动解决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严肃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教育管理，严明党建工作责任。注意抓薄弱环节，着力推动解决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配齐配强院（系）级党组织书记，配强教师党支部书记，确保学习教育有人抓、有人管，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使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管理真正严起来、实起来，解决少数院（系）级党组织和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不严肃、不认真、不经常的问题。要推动解决一些民办高校党委地位缺失，政治核心作用难以发挥，基层党建工作不规范，基层党组织不健全甚至未设立党组织等突出问题。要组织集中排查党员特别是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摸清“口袋”党员、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党员情况，理顺党员组织关系，使每名党员都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参加学习教育。探索开展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毕业生党员的学习教育工作。

### 三、精心组织，切实加强对高校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的领导

1. 加强组织领导。各高校党委要把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摆上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尽好责、抓到位、见实效，按照属地原则，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结合实际对学习教育作出部署安排，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工作力量，加强督查指导。高校党委组织部门要发挥牵头组织协调作用，学校纪委、宣传部门、党校配合做好相关工作。院（系）级党组织要对所辖党支部进行全覆盖、全过程指导，帮助党支部制定学习教育计划，派员参加党支部各项活动。党支部作为学习教育的基本单位，要严格落实学习教育各项要求。要对院（系）级党组织书记、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组织员等党务骨干普遍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工作方法，明确工作要求。教育部成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协调指导高校开展好学习教育。

2. 突出责任落实。组织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职责，要把学习教育作为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考评内容，纳入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强化组织保障。高校各级党组织书记要承担起主体责任，管好干部、带好班子，管好党员、带好队伍，层层示范带动，层层传导压力，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要强化督查指导，既为基层学习教育提供组织保障，又通过学习教育帮助基层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督查指导要注意方式方法，既要督促依靠基本制度抓好学习教育，又要注意发挥基层的主动性创造性，给基层留出空间和余地，鼓励结合实际采取管用有效办法，不搞“一刀切”。

3. 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校报校刊、校园网、电台、电视台开设专栏、专版，利用手机报、微信微博等，开发制作形象直观、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及时推送学习内容，引导党员利用网络自主学习、互动交流，扩大学习教育覆盖面。注重及时宣传推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做法和成效，营造良好氛围。注重典型带动，结合纪念建党 95 周年，做好高校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评选表彰工作，选树、宣传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师生群众公认的优秀共产党员。

各地各高校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及时报我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

中共教育部党组  
2016 年 3 月 8 日

## 保持文明的好奇心

各个文明国度正是在彼此交往和凝视中，开出了令后人倾慕不已的人类文明之花

青春期的文明就像孩童，对自身以外的事物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好奇，并因这种好奇而使自己渐渐丰富。唐朝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时代。当年风华绝代的长安城，不乏从世界各地辗转运来的奇珍异宝，充满国际化大都市的雍容气度。《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正是关于这一时期的名著。

撒马尔罕是古代中亚一个出产金色桃子的国度，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代表着一段逝去的辉煌。7世纪时，撒马尔罕曾两次向唐朝献贡金桃，“撒马尔罕的金桃”也因此象征着风靡唐代的异域文明。本书作者美国学者薛爱华（爱德华·谢弗）是世界著名汉学家，一生精研唐代社会史和文化史，著述颇丰。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就以《唐代的外来文明》为名翻译出版，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唐代文明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正因如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很多西方汉学家，倾注一生精力研究唐朝，摹写那个流光溢彩的传奇时代。好奇心驱动着本书作者薛爱华的学术热情，他像博物学家那样，事无巨细地将全书分为十九章，按照家畜、植物、食物、药物、香料等分类，一一列举曾经在唐朝输入中国的各种舶来品，并对每一件舶来品的来源、词源、输入唐朝的曲折路程追根问底。作者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的功底，对历史语言文字的运用，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丰厚学养，使本书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既包含汉族的，也包含其他兄弟民族的；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从这本书中可以领略，唐朝的外来物品是何等丰富多彩，而这些外来物品对中国社会、中国原有的文化又发生着怎样复杂的、多方面的影响。在长期交往中，很多异域元素逐步融入中国原有文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比如，唐代音乐中苍凉浑厚、引发几多边塞之思的西凉乐，就是龟兹乐与传统中国音乐交流融汇的产物，所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对外来事物态度不甚友好的大诗人元稹曾不无哀婉地叹息，“玄宗爱乐爱新乐”，这一“新乐”正是从西域而来，从宫廷到教坊再到市井少年的口中，最终融入唐朝文化的壮阔洪流之中。

文明的好奇心，不仅表现为对外来珍奇异宝的渴望，还在于通过这些跋涉千山万水而来的异域珍宝，想象一种未曾亲历的生活形态和文明样式。就像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周末走进博物馆，不仅是为了开眼界，也是为了触摸一段逝去的或远方的文明，从而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满。这种好奇心，在人类历史的各个辉煌篇章都能觅得踪迹。从古希腊人对近东的好奇、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融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们在港口张望满载世界各地物品的货船，再到宋元时期，被马可·波罗盛赞不已的中国泉州，“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藪”……各个文明国度正是在彼此交往和凝视中，开出了令后人倾慕不已的人类文明之花。

如今的撒马尔罕，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连接着伊朗、印度和中国，依然是中亚地理的文明心脏。我们今天阅读《撒马尔罕的金桃》，追慕已经逝去的唐代文明，也充满希冀地展望未来的欧亚大陆，能够重现当年商贾云集、驼铃不断的文明交融之盛况。

（作者：白龙，来源：《人民日报》）

## 不要把人吓倒在起跑线

逛书市时，往往能感受到成功学类书籍的火爆。

现今的成功学书籍，很多宣扬的都是“最好原则”——即先假定或暗示你能“做到”，然后再告诉你需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等于说一下子越过了“如何做到”这个其实最重要、最根本的环节。正因如此，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么就一鼓作气地干到最好，要么就干脆什么也别干；要么就是100，要么就是0；要么你就登泰山，要么你就干脆在原地待着。

这种“最好原则”，让谁看都会承认“正确无比”，但是99%的人都会被吓倒在起跑线前。因为这种理论鼓吹的是一种“你要痛下决心，重新做人，来个180度的大转变”的路径，而这恰恰是很多人的致命弱项。对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拒绝变化的人，你偏偏要在他的耳旁大喊“你要转变”，无疑是自欺欺人、对牛弹琴之举。

绝大多数人都会在“转变”两字面前露怯，裹足不前，难下决心；又或者凭着一时的冲动痛下了“转变”之决心，并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但往往是好景不长，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就败下阵来，难见持续性。马三立先生那段著名的《从明天开始》的相声，就是最传神地表现了这一“普遍人性”的经典。

“最好原则”的最大问题在于门槛太高，它往往超越了普通人的能力极限，让绝大多数人“望门兴叹”。或许，“次好原则”才是一种有可能让更多普通人走上相对成功之路的途径。

“次好原则”的核心在于“降低门槛”——它鼓励的是一种“积小胜为大胜”的理论，即如果做不到100，只做到1也行：因为1永远大于0；如果登不上泰山，只登上你家门口的小沙丘也行，因为那也总比原地踏步强……总之，只要你做了点什么，就总比不做强。由于门槛大幅度降低，因此就多了使普通人做到坚持的可能性，而凡事只要坚持，成功概率也会加大。只不过遵循“次好原则”的成功之路，其路程略长一些而已。

总而言之，“最好原则”尽管在表面上打着让所有人都成功的旗号，但它最终能够激励的，实际上还是少数；而“次好原则”，才能有效激励更多的人，尽可能地让更多人受益。

（作者：南勇，来源：《人民日报》）

## 反腐败不是“权力斗争”

带着偏见或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当前的反腐败，往往会得出扭曲的结论。比如，国外一些媒体和人士把自己国家的反腐视为法治的表现，是正义的行为，而把我们的反腐视为“权力斗争”，有着阴暗不可见人的勾当。国内也有一些人随声附和。这种观点的背后或许是出于对我们反腐的不了解，但更多的是一种刻意的抹黑和故意歪曲。

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或势力总是端着“道义”教师爷的架子，板着面孔教训我们，千方百计用腐败问题拿捏、贬低和抹黑我们，不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场合提出所谓反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力正风反腐，利剑挥出，“老虎”“苍蝇”纷纷落马。正风反腐让党风政风为之一变，社风民风为之一新，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同时，我们加强反腐败国际双边多边合作，启动“天网行动”，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将一批外逃多年的犯罪分子缉拿归案，国外不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我们的反腐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国际正义力量和有识之士对于我们敢于向腐败亮剑是佩服的，给予我们的反腐高度评价。但是，那些曾经指责我们腐败的西方国家和势力并没有为我们的反腐成绩鼓掌和喝彩，而是把我们的反腐歪曲为“权力斗争”。在他们眼里，腐败是问题，反腐败也是问题，偏见和恶意在他们那里根深蒂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场合讲过，我们的反腐不是“权力斗争”，没有所谓的“纸牌屋”。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依法依规反腐，坚持以纪律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3年多来，哪一个高官的落马不是因为有着铁一般的违法违纪事实？这些落马官员的案件都是铁证如山，经得起法律、时间和人心的检验，这些人在自己的“忏悔录”中也承认犯罪事实。因腐败而违法犯罪，罪有应得受惩罚，又怎能扯到权斗上呢？曾有人拿“领导人工作过的省份无虎”、“京沪无虎”来说事，认为是“选择性”打虎拍蝇。随着反腐的深入，从党政机关到军队高层，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省区市，反腐无死角、全覆盖，所谓的“选择性反腐说”不攻自破。至于“发现一个、揪出一窝”，这本身就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规律。腐败分子为了自保，总是善于搞圈子、拉帮派，攀人身依附、编织利益同盟，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因此，“拔出萝卜带出泥”也就不足为奇，“顺藤摸瓜”揪出“大老虎”也具有必然性，将这种情况看成是“派系斗争”，实在是牵强附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党和人民与腐败力量的殊死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激烈较量，是捍卫党的性质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捍卫政权人民性、维护权力“公器”的道义之战，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反腐败，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顺应人民要求，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我们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宣示：“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反腐败，无论是谁，不管官多大、根多深、有什么背景，一旦搞腐败，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作者：石平，来源：《求是》）

## 西式民主神话的破灭

——“民主之春”“黑夜站立”运动及其分析思考

近期，西方国家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令人瞩目。一是美国的“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队伍4月2日从象征美国独立的费城独立钟出发，步行10天抵达华盛顿，在国会山前集会示威，抗议金钱操纵美国选举以及政府的不作为，要求改善民主，结束金钱政治，保证公正选举。这一运动4月18日在当局的打压和媒体的漠视中黯然结束。二是法国的“黑夜站立”社会运动。该运动源于一场针对法国政府新颁布的《劳动法》改革方案的抗议示威。自今年3月31日晚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开始，至今已持续一个多月。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主题逐渐扩展至社会治理、选举制度、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多个领域。目前整个运动已经从巴黎蔓延到了法国的70多座城市，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深入分析研究这两大政治事件及其深层次原因，有利于认清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

一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上街要求民主，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因为在一些把西方民主制度奉为圭臬的人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最优的民主模式，代表着人类政治的发展方向，乃至“历史的终结”。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一度要求其跨国公司于海外投资时，必须承担推广其“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责任。同时，把不同于他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民主”已成为少数西方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实现霸权统治的政治工具。然而，几十年来，经由西方民主化改造的国家，不仅没有更民主、更自由、更稳定，很多国家反而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民主化”成为祸乱世界、制造社会分裂与国家动荡的根源。“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会危机，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难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西方民主已经沦为一种民主形式掩盖下的金权政治。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不仅远离财富，远离自由，同样也远离了民主。美国的民主已成为金钱和权利的游戏，普通人则只是这场游戏的旁观者而已。美国《纽约时报》和全国广播公司联合调查显示，至少有84%的选民认为，如今的美国选举中流入了“太多金钱”；85%的人认为，除非改革或是彻底重建美国的选举制度，否则无法改变“金钱政治”这一现实。在“民主之春”抗议活动的参与者看来，当前美国政治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被金钱绑架，华尔街的利益集团不断侵蚀决策集体，使用金钱支配他们“在政府中的仆人”。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政府被资本俘虏，权力与钱力联姻，使所谓民主政治岌岌可危。据《环球时报》2015年9月25日报道，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电视访谈节目时，称“美国民主已死”。他表示，现在即便得到参选机会，他也没有能力参加总统选举，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今年参选的特朗普更是在电视辩论中说：“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时代，亿万富豪正在收买选举和候选人。”

其次，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成为“财团政治”“寡头政治”。西方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有能力提供巨额选举资金的只有财团。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与金融财团、金融寡头是紧紧绑在一起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高涨和70年代“水门丑闻”对美国政治制度重击之后，美国曾对政治捐款上限作出设定，这对金钱政治起到过一定矫正作用。但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的一种”为由，裁定政府限制企业、工会等的政治捐款为违宪，导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兴旺，金钱从而可以曲线施展其政治权力。2014年，美国最

高法院进一步取消了个人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上限，这意味着有钱人影响政治的“言论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证。“民主之春”运动和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对美国当前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抗议者们意识到：统治美国的实际上有双重政府，一是作为“面具”的政府：白宫、国会、最高法院；另一个是掌握真正实权又不受任期限制的政府：大财团、大资本家。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认为亿万富翁和大财阀、大企业才是美国大选的真正玩家。

再次，资本自由和大众平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平等是西方国家最喜欢标榜的观念之一。从西方启蒙运动开始，平等就是启蒙的要素价值之一，是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成为广大中下层大众利益代表的一面旗帜。但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上升到统治地位，就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合中，逐渐以单向度、同质化的方式不断突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价值，尤其把自由强调到难以复加的高度，而平等的价值则逐渐处于自由、民主的附属地位。当社会大众的平等要求与垄断资本的自由原则相冲突时，大众的平等要求就必须绝对服从资本自由的制约和规范，甚至会被纳入为社会主义“敌对意识形态”而加以攻击。于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自由成为核心价值，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民大众长期以来也都“被自由”了。自由压倒平等成为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核心价值之一。这次“民主之春”抗议活动，美国民众通过公开反对不平等的金钱政治形式，要求在资本自由与大众平等之间作出新的权衡与抉择，这必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所推崇的平等只是针对封建社会阶级特权的形式平等，即机会、程序等方面的平等。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事实平等既无可能，也无意义，除了导致抹杀个体差异和营造社会的懈怠之风，别无裨益。

第四，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愈发尖锐。西方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西式民主说到底是为资本集团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服务的。在令人目眩的民主政治博弈背后，终究是选票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敌不过“一元一票”。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与矛盾，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热闹的形式，而实质都集中到经济自由，各类大资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正是由于大众不满徒有虚表的民主形式，因而对投票选举的热情不断降低，对政党、政客的不满与日俱增，不仅有激烈言辞，而且有激烈的行动，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正面临危机。

尤其让人深思的是，面对“民主之春”，美国主流媒体选择集体失语，凸显了其“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类似的街头运动，西方媒体早就铺天盖地“滚动式”报道了，并且多半会不断以支持态势和渲染性报道挑动民众情绪，其结果是游行示威在和政府对峙中变成流血冲突，然后西方国家又会对该国政府进行干预制裁，从而进一步鼓动民众情绪和街头政治。在这种舆论环境和外界压力下，政府根本没有机会在良性状态中恢复正常的法律和秩序，以至最终导致全面失控——这几乎成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街头运动在西方媒体和政府干预下的固定模式。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媒体则很少会因为这样的内政去指责干涉西方，即便有一些指责之声也难以造成影响。这是因为目前的国际传媒和信息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这样的舆论环境使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及时恢复其法律和秩序。

在“民主之春”示威抗议活动中，华盛顿警方共逮捕了1420人次的示威者，抓捕人数创下了华盛顿当地的历史纪录，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肯定会被西方媒体严重政治化和妖魔化。但发生在美国，媒体就非常“宽容”。标榜“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实际执行的是双重标准。正如“民主之春”抗议活动参加者亚历克斯所说，美国主流媒体此次集体“失语”并不令他感到意外，“因为报道反‘金钱政治’抗议活动不符合这些主流电视台的利益”，“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为例，它的母公司时代华纳公司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第八大政治献金提供者。有线电视新闻网当然不会愿意去碰触这些反对政治献金的抗议活动。”而

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传输公司康卡斯特是国会重要的利益集团，是两党的重要捐赠者，同时也是微软全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的母公司。

## 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因两党之争国会不给拨款，联邦政府曾一度被迫关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难民危机又雪上加霜；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全美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种种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

经济难脱困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各国经济不仅复苏乏力，而且深陷高负债和低增长的泥潭。据统计，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债台高筑，有的州濒临破产，只能靠举债度日。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和出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因金融系统过错造成的损失正由社会均摊，收益却进入私人腰包”，“这是扭曲的经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这种现象，折射出西方经济制度的本质：一方面，虚拟经济过度扭曲发展；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空洞化倾向明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分工的浪潮下，把大批制造企业移师海外，结果是企业虽然实现了资源全球配置和利益最大化，但国家却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以英国为例，工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民主之春”“黑夜站立”以及之前的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同其长期以来扭曲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金融服务业的异化有很大关系。

政治弊端凸显。从“占领华尔街”到“民主之春”，民众将矛头直指美国的政治体制，呼吁“将金钱踢出选举”“清理与资本相联的政治体系”，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中的巨额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西方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已被选举政治劫持，金钱的力量已深深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受限于金融资本和利益集团，政客们见风使舵，而不顾经济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因为“连任比责任更重要”。以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为例，债务危机前，有些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

社会动荡不安。“民主之春”“黑夜站立”抗议活动的迅速蔓延，暴露了西方国家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福利减少、失业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触发了社会的诸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以及反危机紧缩财政措施，使西方国家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凸显、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不断，社会发生动荡。2010年以来，先后爆发了希腊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抗议学费上涨、西班牙民众抗议高失业率以及全欧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大游行等大规模抗议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中，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为了转嫁危机，美欧等西方国家以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保护人权等各种借口，发动多次战争，造成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给世界形势带来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 三

西方国家当前正在经历的“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会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向社会乃至政治领域蔓延的结果，也是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和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行经济自由化、取消资本管制、公共部门私有化和全球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等措施。新自由主义鲜明地代表了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金融垄断资本的主要获利模式就是钱生钱，即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这种机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不断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人集中，财富分配越来越失衡。富人们还通过金钱控制选举，使政治沦为为自身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2014年有467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2015年有超过56万人无家可归。英国、法国同样存在阶层固化、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

其次，新自由主义加重了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张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消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的市场保护、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结果造成金融资本主义极度泛滥，加剧了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们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竭尽全力游说国会，试图扼杀所有金融监管法案，导致意在监管华尔街、保护消费者、改革金融秩序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在推出多年后，至今仍是一纸空文。金融资本完全挟持了政府和整个经济，并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再次，新自由主义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造就了一批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培育出大批富可敌国“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影响乃至操纵美国政权，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化，结果导致虚拟经济无度扩张，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在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创造的GDP比重已由1950年的62%降到今天的34%，尤其是制造业所占比重由27%降到11.7%，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则由11%升到20.7%。美国当前所有的经济、社会、债务和政治问题，都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华尔街的精英们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推动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并比赛着进行“金融创新”，以“钱生钱”的外衣掩盖其巧取豪夺的实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一个被完全虚拟化的经济，怎能不发生危机？

最后，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长期以来，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一直在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则把个人主义变成了绝对价值。新自由主义学者曾告诉人们，自由市场经济是通向最高效率、快速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坦途，能使所有愿意勤奋工作并利用机遇的人享有繁荣富裕。但实际情况是，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仅仅依靠努力工作和遵守游戏规则不再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或有尊严的道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漏斗，把最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过滤给了少数财富精英，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激增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

#### 四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虽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但并未超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预见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为了追求利润从来不择手段，因此必须监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监管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贪欲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是资本主义了。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罪恶时说：“资本来到

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早期的资本主义是用粗暴、野蛮的手段来获得最大利润，而现在则用高科技等很隐蔽的手段，如金融衍生品。资本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是，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但与此并存的却是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即通常所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一种不顾市场规模而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又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对此有着生动形象的描述：资本家只要有条件降低工资成本——通过减薪、解雇或生产的自动化——就会想去谋求更高的利润率。但他们忘了，裁员后剩下的那些收入降低了的工人，再也买不起自己生产出的产品了。资本家在减薪上取得的成果，却变成了他们在销售商品时遇到的问题。资本主义从来不想去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周期性出现的情况是，每当资本家为提高利润率而将工人的薪水下调得太过分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危机主要表现为大量过剩商品卖不掉，而现在统计技术、经济预测技术发达了，企业可以估算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需求，并以此安排生产，因此生产过剩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企业的开工率不足。这直接导致失业率增加。今年2月，虽然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在10%以下（9.7%），但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最近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称，美国现在失业率实际数字高达20%。欧盟统计局2016年4月2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欧盟平均失业率为9.4%。2015年，欧盟青年（15至24岁）失业率平均20.4%，西班牙部分地区高达70%以上。可见，新式的“生产过剩”已成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难以克服的顽症。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发生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积累的必然爆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经济高度虚拟化并最终走向泡沫化的过程中，少数金融垄断寡头大发其财，进而又在新层次上加剧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列宁关于金融寡头的理论告诉我们，金融资本家通过控制和联盟工业资本家，实现对劳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如果说列宁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如今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金融帝国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这种攫取超额利润的方式，在使这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道德沉沦的同时，已成为阻碍企业生产革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必然会导致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一切社会危机的本质根源。即使西方国家通过自身调整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经济低迷的困境，那也只是暂时的，其缓解国内矛盾的方法相继失灵，解决国际矛盾的机制日益受到质疑。以至于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感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结。（作者：祝念峰，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来源：红旗文摘）

## ◆原著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摘选）

###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1]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2]，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错误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3]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4]，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5]，杨虎城出洋[6]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7]，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

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8]，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9]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误的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10]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对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虑？然而究竟还不是这样；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

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11]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12]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13]

##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更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14]，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注释：

[1]见本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1]。

[2]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当时已开始实现的中国国内和平和正在逐渐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加紧准备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表面上对国民党当局暂时采取了和缓姿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曾两次唆使伪蒙古军政府发表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集中军力进攻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宣称同国民党军队停止作战。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外相佐藤尚武诡称要调整中日两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日本财阀儿玉谦次等还组织了所谓“经济考察团”来华，诡称要协助中国建成现代国家。所谓“佐藤外交”和“日本后退”，就是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骗人的阴谋。

[3]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随后又把他们押到苏州，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一九三七年四月，这个法院的检察官对沈等提出“公诉”，并于六月十一日和六月二十五日两次开庭审判，说他们违犯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5]西安事变以前，东北军驻在陕西、甘肃境内，同西北红军直接接触，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一九三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隔离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并且乘机分裂东北军内部，强令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和苏北地区。

[6]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原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在释放蒋介石后送蒋回南京，即被长期囚禁。杨虎城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辞职，六月二十九日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但不久也被蒋介石逮捕长期监禁，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的时候，在集中营内遇害。

[7]潼关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重地。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军驻在潼关以东，准备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某些号称“左”倾的人们（张国焘是其中之一），主张“打出潼关去”，向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这种主张是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相反的。

[8]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法国政府积极地参加了十四个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并在这次干涉失败以后继续执行孤立苏联的反动政策。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苏联的日益强大及其和平外交政策在法国人民中的影响，由于法西斯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法国政府才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但是，法国政府后来并未忠实地执行这个条约。

[9]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0]见本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5]。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6页），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二、十三部分（《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4页）。

[12]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二部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14、279—293、400—402页）。

[13]见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原文如下：“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14]这里所说的分歧，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党中央路线和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使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新的一致，标志着这个分歧已经解决。至于后来张国焘公开叛党，堕落为反革命，那已不是领导路线上的问题，而只是个人的叛变行动了。

出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 实践论

(一九三七年七月)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

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里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4]”，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5]。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6]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穿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摔跤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7]。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

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论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实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9]，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

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10]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1]。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注释：

[1]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6]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8]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出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 矛盾论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2]。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3]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4]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正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5]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6]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7]。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一一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一一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8]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9]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10]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燥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

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

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2]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3]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14]，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15]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16]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17]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

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18]），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19]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20]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群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

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

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2]，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23]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

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

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和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

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26]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27]，《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28]，《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29]和《聊斋志异》[30]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

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1]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32]（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3]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

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34]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35]。

##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36]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

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7]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 七 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注释：

[1]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2]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并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页）

[3]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4]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5]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6]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7]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8]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话，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其中第二段“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论》中的原文是：“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9]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0]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11]参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1]。

[12]见《孙子·谋攻》。

[13]魏徵（五八〇—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本文引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4]《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宋江是这部小说中农民武装的主要领袖。祝家庄在农民武装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这个庄的统治者祝朝奉，是一个大恶霸地主。

[15]木马计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著名故事。据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

[16]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17]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8]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19]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20]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1]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2]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3]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4]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25]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6]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7]《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8]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曰。”

[29]《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3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33]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34]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汉书·艺文志》，原文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相对中有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36]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37]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新的译文是：“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出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